



## 梨树县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引路人

田景斌

我出生于1956年10月,197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在吉林农业大学农经专业离职学习2年,毕业后从事农村经济管理工作20年,曾在农村中学、乡镇政府工作过,历任梨树县农经集体资产管理局局长、梨树县物价局局长。2016年退休,现任梨树县发改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在岗工作期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从事农村经济管理,深知解决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和增加收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1981年在乡镇工作期间,我作为第一人,搞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试点。1984年到梨树县工作之后,我深入到全县31个乡镇260个村和部分农户家中,与农户交流,分析村情,帮助村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1990年部分农户之间组成自愿互助小组相互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1999年国家农业部提出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意见,我正式开始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并到梨树乡夏家堡村搞合作模式试点工作,这是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试点单位。当时我提出了指导合作组织20字口号,“搭台不唱戏,献策不决策,参与不干预,减负不增负”,在我的具体指导下,制定了合作组织章程等各项制度。经过3年的合作组织生产实践,得到农户高度认可,通过

多次来到梨树,进行合作组织培训,其中,有一位知名国际友人,亲临梨树,深入农户家中座谈调研,认定梨树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国际合作组织原则。中国科学院张晓山、苑鹏院士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部相关领导曾多次来梨树调研合作社发展情况。

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2006年,有关部门在梨树拍摄了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电影《梨树花开》,我在这部片中担任顾问,该片现已成为全国党员教育的宣传片。“十二五”初,国家农业部在梨树县召开了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场会,为“十二五”期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随后,吉林省、省政府在梨树县召开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场会。2007年,我在北京梅地亚参加了中国工合委员会举办的世界合作组织论坛,加拿大、美国、日本等15个国家和地区学者参加了论坛,会上,我代表发言,讲到了梨树县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和未来,得到了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

## 敢叫日月换新天

——缅怀老红军贾巨文的峥嵘岁月

张德才

1937年,贾巨文便怀着拳拳救国之心参加了八路军。同年,他被派到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贾巨文随三五九旅挺进冀中,任军区特务团团支部书记,三十二团连指导员,1940年他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5年初部队整编,贾巨文任三营教导员。同年3月20日随部奔赴东北到达沈阳。10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保安第一旅,旅长是马仁兴,贾巨文任一团三营教导员。贾巨文参加了整个四战四平的战役,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腿部受重伤,退下火线被送到后方治疗,留下了腿部残疾,靠一只拐杖支撑着走路。1948年底,从辽沈战役退下的伤残军人在铁岭市成立了荣军学校,贾巨文为首任校长。

1949年,贾巨文服从组织命令开发科尔沁草原边陲农场,他带领五百余名身残志坚的战士携带轻武器、以整连整营的建制来到双辽县卧虎屯站,他们肩负屯垦戍边的使命,踏上了新的征程,在这里开辟第二战场。在辽宁省(双辽曾归属辽宁省,于1954年之后归属吉林省)政府及双辽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马开始走访调查选址,当他们走到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和柳条通前,贾巨文拐杖一顿:“就这啦”1949年

也为附近的农村人民公社树立了学习的榜样。1960年,农场不但有了拖拉机,还有了机动四轮车和两台汽车,并有一台可供照明的柴油发电机组。贾巨文身残志不残,一腔热血诠释了什么叫为人民干事,什么叫共产党员。

1989年11月15日前夕,我受组织委派到四平邀请贾巨文参加建场四十周年庆典,但却被他以身体原因而婉言谢绝。当时有些不解,可后来想想这恰恰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体现,他把荣誉和成就看得是那样淡然。

贾老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但他留给双辽农场一代又一代人永远的记忆。这个在地图上从没有过的地名,被他和他的战友用奋斗留下了标注。他亲手策划的地号,如四号地、二十三号地、二十九号地,东坨、腰坨、西坨……在地名普查中已确定为永久性地名。贾巨文率领的五百余名身残志坚的战士们,把一个广袤荒凉的不毛之地开辟成了丰年稔岁、五谷丰登的大粮仓,谱写了改天换地的新篇章。现在的双辽农场,高楼林立,四通八达、五谷飘香,已成为大东北粮仓的重要商品粮基地。

以贾巨文为代表的的老一代革命者的丰功伟绩将会永载史册。缅怀和追忆他们,就是弘扬伟大的党,弘扬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把四平建成军事基地和原料供应地,扩大在面粉加工业的投资,建立了“东洋火磨”和“康德火磨”两个面粉厂,利用北满及四平附近出产的小麦加工面粉,两家火磨共占有职工200余人,日产面粉约150吨,并垄断了四平制粉业。生产的绿宝船、红宝船、兵船牌、胡琴牌等精白粉主要供日本关东军食用或运往日本,所剩无几的白袋粉(普通粉)则配给四平街的饭店及市民食用。

两个火磨开工以来,生产大权都由日本人独揽,上至厂长、课长,下至监工,都由日本人亲自担任。同时日本关东军驻四平的后勤部队一十九部队以在乡军人的名义,驻厂坐镇监督生产。对待中国工人如同监狱管理囚犯,制定了一整套苛刻的甚至辱骂人格的规章制度。如工人上下班出入厂门要搜身检查,工人进厂后立即锁上门,工人吃不饱不许从家里往厂内带吃的。日本人用的洗脸盆、澡堂一律不准中国工人使用;生产时间相互不准讲话,等等,违者轻则打骂,重则开除出厂。

任党支部宣传委员,经母亲介绍认识了沈亚钢。

沈亚钢很活泼,酷爱学习,兴趣广泛,他除了爱好体育运动之外,还喜欢古书、古画、古文字、打台球、游泳、拉京胡,唱京戏。由于宣传工作需要,有时马庚请他当老师,教唱歌、讲课。他讲课、做报告从不拿手稿,很幽默,都爱听,讲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却不笑。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个人互相产生爱慕之情。1941年8月,在党校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分配沈亚钢到冀南一地委(地址邯郸)任宣传部长,马庚分配到四地委任广宗县二区委书记,武装部长。分手以后,两人书信往来。

沈亚刚很有才华,在冀南同王任重、王仲夷并称三才子。9月,有传言说沈亚钢被敌人逮捕杀害了,马庚一边哭,一边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大家也说:“宁可让咱们这些小卒死也别让他死啊!”说着大家就要给他开追悼会。这个时期,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冀南实行“坚壁清野”,推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也是我党军民在党组织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反扫荡时期,为逃避敌人追捕,工作人员都躲在高粱地里,高粱地又闷又热,加上生活艰苦,身体透支,马庚昏过去了,追悼会没有开成。

1943年7月,经战友介绍,在冀南根据地举行简单婚礼,二人结婚,婚后二人在冀南后梯队,后梯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干部和训练干部,共分三个队,沈亚钢任第一队支部书记。

1944年,沈亚钢同马庚一行四人受组织派遣去延安,时逢延安整风,沈亚钢被分配在第一支部参加整风,马庚被分配在第三支部参加整风,整风也称抢救(失足者)运动,纪律很严,组与组之间不准随便说话。

(六)

## 首任梨树县委书记 沈亚钢

单志

沈亚刚在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善于抓大事,抓主要矛盾。从宏观上解决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1962年至1963年,工交企业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此,他会同辽宁省委、沈阳市委工交部的同志,用3个月的时间,对沈阳大型企业进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他发现企业中的最大问题是管理混乱,经过反复论证,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有效办法,既从上而下实行“五定五保”。他强调,国家应对各企业实行定产品、定生产规模;定人员、定机构;定原料、燃料、动力、工具等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厂与厂之间的合作关系。保证企业对国家生产的品种、质量和数量;保证限定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设备使用期限。对工段、车间、班组实行“小定小保”,制定定保方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领导和工人都有章可循。这些意见引起国家经委的高度重视,对国家经委制定工交企业管理条例(即“工业七十条”)起了重要作用,他为东北工交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四、革命伴侣 恩爱夫妻

沈亚钢和马庚既是革命战友,又是恩爱夫妻。马庚,1924年10月出生,双辽县人,在外读书参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庚的母亲也是一位老革命干部,与沈亚钢同在冀南根据地工作。1940年,马庚的母亲与沈亚钢同期到冀南军区党校学习,沈亚钢在党校任党总支宣传委员(宣传科长)。在此期间,马庚奉党组织调遣,去冀南根据地也加入该党校学习,在党校

## 第二编

###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日伪机关未查出任何政治背景,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工人。因罢工组织严密,准备充分,工人们团结一致,加上其他城市工人的支援,这次持续了12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资本家答应将每斤棉花的加工费由原来的3分钱增至5分钱。哈尔滨制棉工人的罢工也取得了胜利,在警察署的干预下,工钱由每斤4分涨到6分。工人们以勇敢的斗争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 (二)东洋火磨工人的三次罢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把四平建成军事基地和原料供应地,扩大在面粉加工业的投资,建立了“东洋火磨”和“康德火磨”两个面粉厂,利用北满及四平附近出产的小麦加工面粉,两家火磨共占有职工200余人,日产面粉约150吨,并垄断了四平制粉业。生产的绿宝船、红宝船、兵船牌、胡琴牌等精白粉主要供日本关东军食用或运往日本,所剩无几的白袋粉(普通粉)则配给四平街的饭店及市民食用。

两个火磨开工以来,生产大权都由日本人独揽,上至厂长、课长,下至监工,都由日本人亲自担任。同时日本关东军驻四平的后勤部队一十九部队以在乡军人的名义,驻厂坐镇监督生产。对待中国工人如同监狱管理囚犯,制定了一整套苛刻的甚至辱骂人格的规章制度。如工人上下班出入厂门要搜身检查,工人进厂后立即锁上门,工人吃不饱不许从家里往厂内带吃的。日本人用的洗脸盆、澡堂一律不准中国工人使用;生产时间相互不准讲话,等等,违者轻则打骂,重则开除出厂。

在日本资本家、厂长、工头的皮鞭、棍棒下,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逢倒班,工人要连续工作18小时。工人们拼死拼活的劳作,得到的工资待遇却极低微薄,每人每月只给15斤粮食,每日只有5角钱,而童工的工资更少,只有成年人的一半,可干的活和成年人一样。不少人还要养家糊口,工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工人如果生病非但得不到医治,反而要被逐出厂外。而且生产条件极差,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工人的生命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许多人因工致伤、致残、致死。

一天,东洋火磨的工人刘永正粉碎豆饼时,因日本监工在旁督促,催命似的逼着快干,他心里一紧张,用力过猛一下子把手塞进了绞刀里,5个手指全部被切掉。狠心的日本厂主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将刘永正开除。工人刘立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糊口不得不坚持工作,直到最后累得吐血。毫无人性的日本监工沙贺因此把他赶了出去:“你的外边去吧!这里不要,不要的。”刘立兴失去了工作,在四平走投无路,只好回关里老家,行至开原因病情加重死在了途中。

工人们不断反抗,起初磨洋工,破坏工具,后来逐渐转向公开斗争,1940年到1942年火磨工人举行了3次罢工。

第一次是在1940年。从哈尔滨调来的孙仁山到工厂当磨头(带班技术工人),他见识广,对日本人虐待工人的现象十分不满,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人的压迫。一次,孙仁山带头反抗并且打了日本工头沙贺。但是,日本工头沙贺并没有收敛对工人的压榨。

(未完待续)

